

※書刊評介※

評《漢字圈的近代：語言與國家》

鈴木將久 *

村田雄二郎、Christine Lamarre 編：《漢字圈の近代：ことばと国家》，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五年。Iv+二二二頁。

這本論文集的書名是由兩個關鍵詞構成的：「漢字圈」與「近代」。「漢字圈」意味著中國大陸、臺灣、朝鮮半島、越南以及日本等所謂東亞國家與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地理概念，更是文化概念。這些國家與地區都曾經使用過漢字作為書寫語言，並以中華文化為正統，在中華文化的影響下展開自己的歷史。「近代」則是歷史概念。近代的定義多種多樣，這本論文集基本上採用國族國家的理論框架。前近代東亞籠統地形成一個秩序體系，十九世紀以來東亞由於各種原因各自進入了建立國族國家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地方出現了現代國家，形成現在東亞的格局。建立國族國家的過程也包含了許多糾葛與暴力，其中不可忽視的環節是國家的語言「國語」的確立。

兩個關鍵詞共同指出一個脈絡：前近代東亞都以中國的古文為正宗，不僅在政治上把古文當作正式的書寫語言，而且在教育上也都學習中國古文，文化上中國古文也占據了中心位置。到了近代建立起國族國家以後，每個地方逐漸地脫離中華文化體系，朝鮮、越南和日本等周邊國家與地區為了獲得語言上的獨立，開始質問漢字的意義，在古文之外創造自己的正式言語。中國大陸也經歷過五四運動反對古文，提倡白話文作為現代國語。簡言之，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整個東亞國家與地區，到了近代以後都開始質疑中國古文的意義，脫離中華文化正統意識，創造現代意義上的國族國家語言。而這些過程正是這本論文集探討的課題。

* 鈴木將久，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副教授。

這本論文集是以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講義為基礎形成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最主要對象是本科一、二年級的學生，這一對象特點使得這本論文集行文簡練、表述清楚。不過編者並不因此降低內容水準，而且因為是作為大學初級教材出版，集中討論核心問題，從而表現出當今日本漢學界在此領域的理論和思想水準。

這本論文集一共收入了十篇文章。村田雄二郎〈漢字圈的言語〉是導論性的文章，說明這本論文集的基本前提與課題。他從國族意識與國語的關係談起，敘述東亞各國脫離漢字權威，以此形成國族意識的過程，最後引用酒井直樹的理論探討了現代國語包含的意識形態。

導論之外的九篇文章又被編者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題為〈語言與權力〉。若林正丈〈臺灣的近現代與兩個「國語」〉討論近代臺灣的語言問題。前近代臺灣保持多語言狀況，到了日本殖民地時代後，開始全島統一的日語教育。臺灣人卻通過日語教育學到國語意識，展開民族語言運動。在此基礎上戰後國民黨政府推行了國語政策，然後隨著民主化又出現了多文化主義。安田敏朗〈國語・日本語・帝國〉則探討日本帝國主義與語言的暴力性問題。國族國家的國語要求時間與空間的單一性與透明性，從而動用暴力手段排除一個國家內部的許多方言。同樣地，隨著日本帝國擴大，硬說日語具有普遍價值，運用跟排除方言一樣的邏輯，把日語強加給殖民地民眾。平田昌司〈別說，危險：十七到二十世紀中國女性的語言〉討論古代中國語言中的性別問題。古代中國的語言秩序上，女性只能在家庭內部的私人空間講話，走出外部的公共空間就喪失發言權利。書籍流通量的增大導致這個秩序動搖起來，接觸了西方文化的五四運動更打破古代秩序，使得女性邁出到外部的公共空間。

第二部分題為〈從古典離開〉。齋藤希史〈漢文的命脈〉討論日本明治時代初期「漢文」發揮的重要作用。日本的漢文幾乎等於中國文言文。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建立以朱子學為中心的全國漢文教育系統。明治時代更出現了現代媒體，因此漢文普及到日本全國，成為日本公共空間的普通話、同時成為引進西方新概念的載體。伊藤德也〈近代中國的文學言語〉討論從五四到三十年代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胡適、周作人等人各自創造使用俗語避開古典格律的新詩，不過聞一多追求新詩的格律。同樣地，小說的文體一方面努力地離開舊小說技巧，另一方面追求新時代的語言規則，從中出現了歐化語言與大眾化語言的兩種語言思潮。中島隆博〈打鬼：白話、古文與歷史〉則解構胡適有關白話的思想。胡適有意追求創造透明易懂的白

話，他的重點在於有意的實踐性，從而試圖重新解釋中國歷史。不過他這種態度本身遵循中國傳統的某種文化模式。因此胡適的有意革命，反而陷入中國傳統的文化政治。

第三部分題為〈不同的文字體系之間〉。岩月純一〈近代越南的「漢字」問題〉敘述近代越南建立國語的過程。前近代越南以中國文言文為正式書面語。越南獨立後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後來法國殖民地時期普及了羅馬字拼音法。當時越南的語言狀況相當複雜，中國漢字、越南字母和羅馬字拼音法交錯。隨著國族國家的建立，羅馬字拼音法成為正式語言，中國漢字被廢止。生越直樹〈朝鮮語與漢字〉討論朝鮮的文字問題。前近代朝鮮只有中國漢字作為文字，不過朝鮮話與漢語的差異相當大，使得十五世紀朝鮮發明了自己的文字。後來民族情緒高漲，更走向韓文字母。二戰後朝鮮分裂，南北朝鮮各自發展韓文字母，最終幾乎廢止了漢字。C. Lamarre〈地域語書寫：客家話的案例〉介紹基督教傳教士為了宣傳《聖經》試圖創造地域書寫的活動。前近代中國語言狀況也相當複雜，文言、俗語、白話和官話等多種語言互相交錯。相對於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教士本來重視俗語，他們面對中國複雜的語言狀況進行許多嘗試。其中之一便是傳教士創造了客家話的漢字表記。

顯然地，這本論文集涉及到的範圍廣闊，內容豐富，而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視角又使本書蘊含一定的張力。比如，若林正丈好像暗示日本殖民統治，某種意義上給臺灣民眾帶來現代意識，安田敏朗則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帶給臺灣民眾的暴力。不過，這兩種看法的差異與其說是難以並存的對立，不如說是不同位置、不同視角的表現。換言之，他們兩個人分別從臺灣和日本帝國的位置出發，表現出日本殖民統治給歷史帶來的複雜性。由此可見，這本論文集雖然是入門書，但關涉到的卻都是日本漢學界必須深入研究的重點。因此，說這本論文集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今日本漢學界的學術水準並不為過。底下，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探討這本論文集所提出的問題。

第一，它特別注重漢字與國族國家的問題。語言與國族國家的關係，從安德森到酒井直樹已經討論得相當深刻。日本漢學界當然也重視這些學術成果。問題是，日本思想界思考日本國族意識與語言問題的時候，不得不質問漢字的問題，因為日語裏面漢字處於很特別的位置。無論語法、發音還是語用等各方面，作為語言結構，日語和漢語的差異非常明顯，因此日語保留了從中國傳來的漢字，便在相當意義上成了日語內部的「他者」。許多日本思想家認為漢字的存在表示著日本文化裏

面埋有中國文化的影子。日本江戶時代本居宣長為了尋找純粹的日語，批判有關中國文化的原素，特別是批判漢字。現在全球化時代國族意識又高漲起來，又有人質疑日語內部的漢字問題。由此可見，從本居宣長一直到現在日本國內，不斷地出現保持純粹日本文化，排除中國文化的想法。不過現在的日語實際上離不開漢字，因此漢字的存在使很多國族情緒過強的人感覺困擾。

這本論文集則藉由介紹東亞各國與地區，處理漢字問題的歷史思考這一問題。它的貢獻首先在於讓日本思想界能夠把漢字問題從日本國族主義情緒抽離出來，通過比較的方式，學術性地展開討論。它給日本思想界展示了漢字問題不僅是日本思想的問題，也是包括中國本國在內的整個東亞在近代歷史裏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越南、朝鮮等各國與地區對漢字問題的處理方式都不一樣，這使得日本思想界先前對漢字問題的看法相對化。因為，到了近代所有東亞國家與地區都把漢字文言定位於國語內部的他者，從而分別展開思考漢字文言與國語之間關係的思想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活動都發生在近代，換言之，近代國族國家的成立產生了漢字文言與國語成立的問題。而東亞的近代充滿暴力，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外，越南近代也受到法國殖民統治，不僅如此，中國還經歷了漫長的革命。這本論文集清楚地展現了東亞各國與地區討論漢字問題時所纏繞的權力與暴力，從而可讓讀者重新思考文言漢字的近代遭際，與近代國族國家的建立所帶來的破壞性的纏繞關係。

第二，它涉及到「帝國論」問題。當今帝國論的流行無疑由全球化引發。隨著全球化，一方面出現了更多的跨國公司、跨國組織等超越一個國族國家的力量，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抵抗全球化的跨國連帶。這些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變化更容易使思想界獲得對國族國家的相對化立場，從而更容易開始把它作為學術對象，進行積極的研究、反思。帝國論基本上在國族國家批判的脈絡裏形成，試圖探討國族國家喪失力量以後的世界秩序，尋找超越國族國家的出路。不過，當今的帝國論同時包含了對強大國家的危機感。最近許多人感到美國成為新時代的帝國，日本國內主張「中國威脅論」的論者認為中國還是帝國。而這個意義上的帝國指稱延續了二十世紀貶稱帝國主義的語義。顯然，現在世界的「帝國論」產生嚴重的混亂。有人尋求超越國族國家的新的理論框架，有人甚至期望形成抵抗國族國家、抵抗全球化的新的社會力量，不過也有人為了反對目前的強大國家，從簡單的國族情緒出發討論帝國論。尤其在日本關涉到中國問題時，這些混亂更為加劇，逼使日本漢學界不

得不回答有關中國與帝國的問題。

這本論文集以不顯著但清楚的言詞敘述中國與帝國的問題。它首先討論前近代中國的秩序結構，強調“diglossia”（雙語言並用）概念：社會裏除了日常生活上使用的俗語以外，還有公共場合上使用的高位言語。中國古典的文言文是典型的高位言語，因此前近代中國可說是 diglossia 狀態。可見這本論文集拒絕最近日本國內流行的中華帝國論，運用學術方法研究所謂「中華帝國」的實際情況，從而分析前近代中國的多樣複雜的結構。更重要的是，這本論文集也強調前近代中國的秩序結構受到國族國家的衝擊完全崩潰了。換言之，一方面分析前近代中華帝國的結構，另一方面還把它定位於近代東亞的歷史裏。在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它提起「漢字圈」絕不是為了重構文化上的中華帝國，而是為了檢討東亞各國與地區建立國族國家的歷史經過，從而獲得超越一個國族國家限制的更廣闊的視野。

第三，它注意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的關係。了解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的關係以此描寫更全面的中國形象，是日本漢學界的一大課題。二戰以後日本漢學界一般把兩者分開理解。其原因首先因為，古代中國研究者與近代中國研究者完全隔離開來，近代中國研究者往往同情於中國革命，因此看重革命之前與革命之後的斷裂，中國革命的契機被認為是西方的衝擊，解釋中國革命時套用來自西方的歷史階段論等等。當然也一直有人主張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的關聯性，像溝口雄三先生。溝口先生主張中國從宋代以來逐漸地發展出一種市民社會，中國一定程度上擁有自己的現代性。溝口先生的說法在當今日本社會裏顯得特別重要，因為他提出了一個更全面的中國形象。最近日本媒體、思想界需要的不是學術性的中國解說，更不是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而是能夠統合巨大中國的原則性理解。因此漢學界也不得不面對理解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之間的關聯性。

這本論文集中直接討論古典中國與近代中國之間問題的是齋藤希史與中島隆博。齋藤強調產生現代語言時，古代語言所起到的中心作用，同時質疑消除了古代語言後，現代語言所實際具有的性質。他暗示現代語言卻沒有全部去掉古代語言，還保持著古代語言的某些性質。中島更清楚地質疑白話思想其實包含了古代中國的邏輯。創造白話同時重構歷史，是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中心問題，因此中國現代思想某種意義上重演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傳統。由此可見，這本論文集充分重視表面上進行了革命的近代中國，其實保留了古代中國的思想遺產。亦即它不主張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斷裂的史觀，但也不簡單地主張古代中國與近代中

國的連續性，而試圖通過分析古代中國與近代中國之間的關聯與繼承關係，提出更全面更真實的中國理解。

如上述三個方面，一定程度上都展現了日本漢學界在日本思想界中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這本論文集包含了學術性分析與直觀性結論，因為日本思想界就要求這兩個層次的言論。在日本國內中國形象顯得既重大又混亂，人們都認識到當今東亞政局上中國的重要性，不過誰都把握不住中國問題的要害，導致一方面出現許多荒唐的中國論，另方面要求漢學界回答多方面的問題。顯然，這本論文集是日本漢學界對日本思想界的一個回答。它以一個大學入門書的形式出現，使得它得以比較靈活地講述多方面的問題。藉這本論文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今日本思想界對中國問題的困惑，以及日本漢學界對此一困惑的嘗試性回答。

（撰寫這篇小文承蒙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賀照田先生多方面的幫助，在此深表感謝。）